

第一章 起源

第一节 足球的发端及历史渊源

哲学、产生和由来

足球非关生死，但远胜生死。

——英国俗语

对这句谚语最初的惊讶开始消逝后，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开始寻找其中可能隐藏的含义。几经思绪紊乱或宁静深思之后，许多人最后都试图将它解释为英国式的黑色幽默，其他人则把它理解为与比赛规则、俱乐部活动相联系的英国式的激情。然而，只有内行人才懂得其中的奥秘。

打开奥秘的钥匙在于纠正普遍存在的错误观点，即英国是足球的发源地。这一观念的核心依据是，成立于 1863 年的英国足球联合会（FA）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的足球协会，而且，英国早在 19 世纪就率先形成了有组织的体育赛事——包括足球联赛、定期在温布利球场举行的优胜杯决赛和泛英国国家足球比赛。除了管理上是首创者以外，在比赛规则的制定、系统化和不断完善方面，英国人无疑也享有盛誉。这些我们今天都有目共睹。谈到足球，也即用脚踢球这一想法，他们有流传下来

的关于欧洲足球历史的最早资料：1350年，爱德华三世通过他的办公厅颁布了禁止从事足球运动的公告。尽管那时的足球尚无比赛规则，也没有成立俱乐部，而且允许以手触球，形式上更近于橄榄球，但仍被视为一种日益明显的危险。国王和军队最高统帅都认为足球是一种“无益的活动”，批评它妨碍大众进行兵役训练。而查阅欧洲以外的足球资料则可以发现，在公元纪年开始之时，一位中国哲学家就已经在一篇抒情散文中将足球比作月亮了。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抓住英国人的丝质俱乐部队旗，问他们道：“是谁发明了足球？”

中国哲学家怎么可能把一种尚未存在的事物和月亮相比呢？

事实上，这项活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如果进一步研究这一信息，还会有另一个惊人的发现：一个多世纪以来，足球一直被看作是普通老百姓的活动形式，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谈论这个话题的主要是知识分子。月亮和足球之间的相似之处确实给人们进行观察比较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首先，球体以及它的基本形式，也就是圆形，都具有完美的几何构型。在所有已知的形状和物体中，圆是一种特殊的状态，它是“体现”无限性原则的惟一结构。无论这个圆是大还是小，都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起点或者终点。圆的计算和圆周率常数 π 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 π 绝对算得上一个纲领性的奇迹，它在小数点之后有无限多位小数，表示的是一种“有限的无限性”，在关于圆的计算中，每时每刻都能够而且必须作为可求的常数使用。

除了存在的相对性之外，数字 π 还体现了固定、不变和绝对，而且是计算（即外理）所有球体的必要前提。

如果圆对于思想家来说是神性的象征，是有限和无限的交点，那么三维的圆，也就是球体，则纳入了一种新的因素：偶然性。现在一切都可能了，但又都不再是肯定的了。

无限可以造成混乱：如果一个人试图沿着圆去追踪无限，并开始旋转，不久即会迷失方向。上与下、左与右都没有了，消失了——一切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幸好这样的情况在月球上不会发生。这与月球运动的速度并无多大关系，主要是因为观察者自以为他的位置是固定的。从他那个位置看出去，月亮“升起来又落下去”。但这一现象不过是源于固定地面上的特殊视角，源于一个臆想的固定不变的位置罢了。

因此，要测量相对就需要有绝对。月球是这样，足球也是如此。足球必须踢进一个标出的固定目标，而且只能向着这个目标踢。只有这样，进攻的球队才能达到目的。而所有的进攻最终又都集中到一次射门上：即使足球紧贴球门而过也是无效的。固定不动的球门是每个球队的目标，也是每个球员的目标。要么攻门，要么守（自家）门。动态（球员和球）和静态（球门）之间的关系就这样确定了。球门从而具有了庄严、绝对、超越物象的含义。

这种中心作用体现在每场球赛的开幕形式中。在人们为如何开始比赛感到棘手之时，足球在数学上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在开球即比赛开始之时，动态之物，也就是体现欲望的足球，位于两个静态之物（球门）的正中央，正好处于足球场垂直和水平方向的中心位置。这样，从一个球门中心点出发，越过整个场地到达另一球门中心点的假想线，和球场的中线恰好相交于一点，而“前锋”或“核心队员”总要在这一位置将球随意踢到对方的半场，比赛便随之开始——这也是规定。现在，比赛开始

了，足球开始了在球门之间通常为时 90 分钟的来回奔波。

对于亚洲的思想家来说，这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概念了。人的一生有如‘善’与‘恶’两支球队争夺之下的命运之球，它发端于绝对，即无形存在的永恒深处，经由相对，即形式、表象和个性的海洋，历经快乐、尝试、经验、迷惑之后，通过自新、完善和彻悟，最终又回归绝对，回归到本原和目标——涅槃。这是生活的意义，因而也是崇高的目标和惟一的任务。

人生旅程中伴随着规则和自然规律。亚洲人将这些看作人生的辅助工具，也就是说，它们服务于人的学习和认识，限制整体并使得整体的无限多样性成为可能并可以理解。

足球规则的作用也类似于自然规律——也许越位规则是个例外，它们确保力量无限而自由地得到发挥，并以惩罚措施消除无效、危险或不公正的行为（公平竞争）。个体必须适应这场游戏。在生命运动中，这一任务称为进化，即从一个点到一个更高水平的点的运动。而在足球比赛中，这一旅程则是从本方球门到达对方球门。

与侵略战争类似，足球比赛也是对场地的争夺。场地是无限性的可见部分，因此也是一个适于寻找真理的地方。在那位中国哲学家之后差不多 2 000 年，来自鲁尔区的智者阿迪·普赖斯勒出现了。作为一个教练，他代表了五十年代的足球人。他对足球的观点是简单、直接甚至粗鲁。虽然这位足球教练没能清晰无误地将他的理解表达出来，但他的要求半个世纪以来却反复得到引用：“真理在球场上”。球场的大小差别甚大。但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球场的长度要在 90 米至 120 米之间，宽度要在 45 米至 90 米之间，同时，边线的长度一定要超过球门线的长度。

足球是一种讲究战术的运动项目，对阵的双方必须为赢得

领地的控制权而厮杀。“罚球区”相当于首都，球门则是国王的宝座。如果一方成功地占领了另一方的首都，那么敌人什么时候丧失抵抗能力而投降，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足球用一个词便道出了那些复杂的战略战术的核心：实力游戏。每一种足球理论，所有的比赛体系，都是建立在如何控制场地这一基础之上的。著名阵型的发展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假如最初的球员都擅长单个位置而且是带球能手，那么在 20 世纪初的时候便会出现成体系的进攻组合了。在足球阵型形成的初期，德国最有名的流行语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沙尔克陀螺”。它的核心秘密在于，让不控球的队员自由跑位，这样，控球队员就可以有更多的传球机会。如果队员像塞潘、库左拉那样有极佳的控球技术，对手光是看着就已经眼花缭乱了，根本不知道应当进攻还是应当盯人防守。这样，“陀螺”的含义就容易理解了。五、六十年代时，世界上广泛采用的是所谓的“世界杯阵型”(WM)：两个后卫，三个前卫，五个前锋。但是，强调防守和新战术的人士对这种阵型提出了批评。最迟在 1966 年的英国世界杯上，这种阵型最终被取代。重要的人物有：卡尔·拉潘，同名防线的发明者，意大利传奇球队卡腾纳奇奥的先驱。该队曾由“奴隶贩子”海伦尼奥·赫莱拉通过国际米兰成功地带入了一流俱乐部的行列（“所有关于漂亮足球或进攻的议论全是废话”）还有皮济和塞萨尔·马尔蒂尼，他们早在足球皇帝弗兰茨·贝肯鲍尔之前就发明了自由中卫——首先在防守队员后面作清道夫，以加强防守。

从世界杯阵型又发展出了“4-2-4”阵型，70 年代之时在全世界都颇为流行。到了 80 年代，进攻型打法持续衰退，常见的阵型中仅剩下两名前锋，最多三名，但中场队员却有三名或四

名(4-4-2 和 4-3-3)。这种防守型打法甚至促使欧洲足联采用“客场进球规则”，即在两队主客场比赛结果都平局的情况下，客场进球加倍算分。该规则首先在欧洲杯上实行，后来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推广。这样，只关心比赛结果的钢筋混凝土般的防守打法遭到批评，进攻的观点站了上风，攻势足球重新崛起，特别是因为在客场攻进一个球比在主场打进两个球相对要容易一些。在当今时代，奥韦拉特风格的传统中场布局也已经被现代的比赛阵型所取代。在现代的阵型中，中场的强弱决定比赛的结果。在专家们看来，在 90 年代以及未来，决定比赛输赢的中场(场地布局、阵型讨论)为“飞奔的矮脚虎”(如 90 年代初的哈斯勒、哈吉)、工兵”和“跑不死的马”(如刚开始足球生涯时的马特乌斯和现在的杰里梅斯)、尤其是技术精湛的全能球员所主宰。他们抢到球后，直接从防守转为进攻，像以前的核心球员一样立刻通过传球拉开空当，带领自己的球队发起进攻。这基本上就是“全攻全守”的打法。这类球员的第一个典型代表是卡洛斯·邓加，他是 1994 年世界杯冠军巴西队的队长。在新世纪之初，理想的球员则是埃默森、埃芬伯格和雷东多。

如果足球比赛可以从理论上理解为对场地的争夺，那么球员则完全可以比作士兵，这完全合情合理。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视角，是教练员的观察角度。教练要求球队讲究战术，讲究策略，并要求自己的中卫队员在 90 分钟之内紧盯对方的中锋，“必要时连他上厕所也要紧盯不舍”。对于主教练来说，球员就是士兵，是球队这个集体中的一个功能单位。

对于体育场中的人来说，教练只要率领球队获得了成功，他就是英雄，就是上帝。教练都会严格约束自己的球队，好的教练还能够从内部“控制”球员。在体育场中，球迷随时准备拜

伏在偶像的脚下，期待着将他们的共同愿望与一个人、一件球衣、一个号码、一个名字、一个动作联系在一起，在某个焦点时刻爆发出集体的兴奋和激动。随着比赛的进展，每个球员每时每刻都可能因为一个比赛场面或一次正确应对而成为球星，成为超级球星，甚至成为拯救者。这一切只需要一个将足球、球门、拼抢和激情联系在一起的動作，使观众在对进球的欢呼中达到集体的“性高潮”。“性高潮”的比喻源于巴西超级球星贾德尔，他在破门之后就是用这个词来形容他的感觉的。施瓦本人“金色轰炸机”于尔根·克林斯曼在射门成功之后，也说自己“几乎享受了一次性高潮”。

皮制足球、球员和观众激情之间的融合向来都是在特殊的场地中隆重举行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体育场，其前身无疑便是古代的圆形露天剧场。如果说对足球的奥秘和背景做哲学分析是亚洲人的事情，那么西方人则可以在比赛纪律方面，也就是在物质层面上，继续探索。足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奥妙就在于它的群众效应，在当今的时代尤其如此。

听一下魏玛枢密顾问歌德对这一话题的看法，就可以大致理解这种现象了：“因为圆形露天剧场（体育场）原本就是用来让大众尽情表现自我、愚弄自己的地方。他们已习惯于胡乱走动，习惯于无拘无束地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但在这里，这只本来千头万绪、摇摆不定的千首动物，却形成了一具高贵的躯体，结成了一个整体，原来的大众成了一个人，并因神灵的魅力振奋不已。”

迪尔克·许默尔：《上帝是圆的》

“椭圆的形状简单明了，每个人看到后都会感到异常舒服；
每个人都是一个尺度 从而彰显整体的伟大。”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能不能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呢？

从上面谈到的内容可以知道，球门就是目标，就是本原。
在观众极度狂热的欢呼声中，足球在“士兵”或“犹太教大祭司”
的脚下因观众视角的不同在体育场内来回运动，从一个固定的
球门奔向另一个球门，目的是达到这一静止之物，从而结束一
切形式的运动，并以一个可测量的结果（进球）完成进攻，然后
再重新开始。

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具吸引力的比赛，其内容和原则大致如
此。不过，还有一点需要讲得更清楚些，因为人们在谈论足球
时 似乎常常会忘记它 尽管足球有几何的、数学的、哲学的、逻辑
学的定义和规则，但是，与其他所有的运动项目相比，它更
是一种游戏。

比赛也要靠运气，而运气无论在数学上还是在哲学上都是
无从测量的。它是一种自在的状态，而足球比赛的另一个魅力
正在于此。规则和运气结合在一起，几乎必定产生一样让人们
最害怕又最渴望的东西：命运。还有它的两个基本结局，这就
是：悲剧或者喜剧。主持“文学四人谈”节目的德国文学教父
（马塞尔·赖西-拉尼茨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精辟地评论道：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戏剧能像足球这样一目了然。”

足球比赛关乎一切。它涉及数十亿财富，吸引着数十亿
人。如果要问，为何偏偏是这项运动如此流行，那么，在寻找问
题的答案时首先不能够忘记一点：这项运动具有宗教的基本因

素。每一种宗教的中心主题都是解脱：从个体的尘世生活中解脱（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或者像亚洲人所理解的那样，从无休无止的生死轮回中得到解脱。从来没有哪个问题像这个主题那样引起了人们的深入思考。因此，下面的情况就不难想象了：某种同样复杂的内涵如果能以简洁易懂的形式表现出来，就会有大量感兴趣的人拥护。从社会功用方面看，从工业无产阶级时代到今天，足球一直都是一个广受欢迎的角色，或许还是一种必要的调剂（或者是消遣？）：它可以使恐怖的日常生活有两三个小时变得有滋有味，并为随后的一个礼拜提供谈资和想象素材，直至下次比赛来临。

由于比赛简单明了，每个人都有能力或被邀请来发表自己的预测和分析，表达自己的偏爱和反感，并由此进入球迷的虚拟世界，也就是一个与物质的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世界，从而忘却在社会中生存的艰辛。这是一种“希望”原则：它通过许多次足球比赛中救赎的，也就是宗教的因素，体现出来。像在各各他与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一样，在 1999 年的欧洲冠军杯决赛中，曼彻斯特联队也完全是在最后一分钟才获得拯救的。

足球带给我们的信息清晰明了：不管过去如何，不管现在怎样，总还是有最后的机会的，它可以使其他的一切立刻都成为相对，并从根本上将它们排除、扭转或超越。这时候，没有人再去追究曾经的罪过或失误，因为一个正确的举动即可走向“解脱和神的赐福”，而且不附加任何前提（曼彻斯特联队二队就是这种情况）。它是命运的恩赐，是救世主的功劳：无论是各各他的耶稣，还是曼彻斯特的谢林汉姆，他们都是救世主。

体操之父雅恩和粗野的脚下游 戏：以职业取代杂芜

英国至少是欧洲足球之母。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它在欧洲足球发展史上都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对于德国来说尤其如此。随着工业化和民族国家两大中心主题在社会中的并行发展，德国国内产生了一种不容忽视的抵制一切英国制品的情绪。来自这个岛国的足球被德国严厉的教育家们称为“粗野的脚下游戏”，而最犀利的反抗言辞则出于体操之父雅恩之口：德国人不踢足球，德国人做体操。

荣誉、自由、祖国和著名的四“F”组合，这些词的意义都和足球无关，不过，它们已开始失去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了。尽管这位体操之父其实更是一位革命者，而并非一个市侩，但他的哲学在此期间还是沦为了陈旧落伍的东西。19 世纪末期的人们渴望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欢乐。体操运动限制个人的自由，它只要求完美的体形和优美的表演。相反，足球却是一汪涌动着的潮水。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体操是单人从事的运动项目，足球则是集体配合下的运动形式。这又是一个新奇而惊人的对比：球队和单人表演、个人和集体、战术和游戏、纪律和天才。

这样，足球在最短的时间内便超越体操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不过，除此之外，或许还有其它的原因。一方面，是布满灰尘的体操馆、器械、垫子、规则和严厉的体操教练，还有按规定要

德 语 Frisch(清新)、Fromm(虔诚)、Fröhlich(愉快)、Frei(自由自在)四个词的开头字母都是 F，故为“4F”。

完成的根本就不可能的任务：完美的造型或动作。另一方面，是一种在室外进行的关于所有可能性的游戏，那里既凸显个人的重要作用，又强调战术应用、教练意图和团队的配合。球员自始至终都必须参与思考，要能够根据情况当机立断，要适应赛场实况而不是复制造型。优秀的球员会“阅读”比赛，他们站到哪里，足球通常就会飞向哪里，这一点让人惊诧不已，如后来的格尔德·穆勒。个人一方面具有自己的价值和作用（位置和任务分工），另一方面又是集体的一分子，要依靠集体并属于集体。这无疑正是足球所以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决定因素，在今天依然如此。

此外，沉静的亚洲人还会智者似地微笑着指出开始时提到的那个几何原则，并得出结论道：圆形（无限）当然会战胜角形（有限，即体操器械）的。

这样看来，具有世界影响的足球最终将在德国战胜艺术体操，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不过，德国足球历史上的开路先锋是谁呢？他们的目标又是什么？这里又不得不澄清一个流行的偏见。70年代中期，第一批身穿裘皮大衣的女士屡屡出现在足球场的贵宾包厢里，这一现象曾引起公众好奇的议论：足球难道不是工人阶级和普通老百姓这些无产者的运动吗？那么这些衣着时髦的阔太太到足球场干什么来了？红指甲也拿黄色的入场券？她们穿的可是大衣围裹之下的高级长统袜呀！

虽说足球过去和现在都是下层人的体育活动，但如果没有特权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帮助，足球在德国既不会产生，也不会得到推广。尽管在上上个世纪末的时候，足球遭到了行政当局、教会、家长、尤其是体操运动员的排斥，但知识分子在足球运动的引进方面还是起了关键作用，他们还采用了英国的斜传打法。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有教育家费利克斯·林内曼、德国足

协第一任主席费迪南德·许佩教授，还有来自曼海姆的施佩希特教授。不过，最重要的一位却是罗伯特·科赫，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细菌学家。1875年，来自克拉斯塔尔市的科赫将英国的足球比赛规则翻译成了德文。一年以后，他发现了炭疽病菌孢子，震惊了世界，并且第一个证明了“活的微生物是传染性疾病的病原体”！这位天才的教授是否意识到他所做的这两件事情在内容上有着惊人的联系呢？“一个活的微生物”，也就是球员的想象力，与比赛的器具，也就是足球，结合在一起，于是造成了“群众性感染”——激情！足球这一现象还极少被人如此精确地描绘过。

这样，第一步是迈出来了。考察前后过程，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都强调足球这一新兴运动项目的教育价值，强调它的教育潜力！在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足球运动接二连三地展开了。1880年，英国提出异议，反对只强调教育功能。三年之后，德国的学生社团放弃了强制性必修的体操课。这在保守者看来是没落的开始，他们有他们的道理。1885年，来自法兰克福的格奥尔格·洛伊克斯在柏林创建了德国第一个足球俱乐部。经过反复考虑，俱乐部起名为“法兰克福”。由此，洛伊克斯先生为法兰克福在日后德国足球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法兰克福不仅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足球协会，即德国足协的所在地，是德国足球联赛奥芬巴赫丑闻曝光的地方，而且还毗邻银行和德国的“曼哈顿”——金融巨头汇集之所。

1891年，随着足球运动的广泛传播，一个全国性的联合会，即德国足协的前身成立了：德国足球和板球联合会。俱乐部的数量还很少，而球队也主要是从地区和城市队中选拔出来的。

创始年代、俱乐部和第一次正式比赛

正值世纪之交之时，许佩先生、佐默迈尔先生、瓦姆瑟先生和曼宁先生联名申请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足球联合会。他们在会议记录中写道：“现在是时候了，有必要产生一个组织完备、具有权威性的德国足球联合会”。申请以四分之三的多数票通过。全国大会的地点定在体操运动基地莱比锡。就在当年，俱乐部便接二连三地成立起来。在南方，有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凯泽斯劳滕第一俱乐部以及颇具传奇色彩的纽伦堡俱乐部；在西部，有亚琛-阿莱马尼亚俱乐部和格拉德巴赫-普鲁士人俱乐部；在首都柏林也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即迄今为止已有百年辉煌历史的柏林-塔斯马尼亚 1900 俱乐部。1902年，当英国足协杯决赛在温布利球场举行时，现场已有 13 万名为足球而倾倒的观众。而德国又用了一年时间，也就是到 1903 年，才开始举行首次公开的德国足球冠军比赛，现场观众至少有 1500 名。每个观众都得亲自和裁判打交道，因为裁判负责卖门票，票价是每位成年人一个德国马克，中小学生票价减半。当裁判亲自撑起木门，并用锯末标出边线后，比赛就可以开始了。可现在还缺少球呢。于是就弄来一个替代球，由一位参加决赛的球员用嘴把皮球吹鼓起来。难以想象吧·安迪·默勒会在球场中吹球？或许吧。德国第一个足球冠军 VFB 莱比锡俱乐部的球员不仅“能干”，而且还有点儿另类。德国足协的官方报道后来证实，他们坐在火车三等车厢的行李架上前往汉堡，在上半场便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的对手布拉格队击溃了。但

两年之后，他们不得不放弃卫冕念头，因为他们付不起从莱比锡到决赛地点科隆的旅费。

纸 不过，国际形势在不断发展。1908年，“德国最优秀的十一名球员”和瑞士最优秀的十一名球员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中碰面了。在球场上，球员们也以“您”相互称呼。在巴塞尔五千名现场观众中，有从德国远道而来的拉拉队。每位进场的女性观众都会得到一块巧克力，而市场营销在当时尚未发明。比赛之后还举行了一次宴会，要求男士穿燕尾服或小礼服。当德国的第一批国脚兴致勃勃地回到宾馆时，头上戴的德国足协的红色帽子使他们看起来滑稽可笑。

瑞士。也是足球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至少对德国人来说是这样的。在德国足协的历史上，瑞士扮演着助产士和记分牌的角色，而且还是德国足球初次问鼎世界杯的舞台。1908年，在瑞士举行了第一次有德国参加的国际比赛。1920年，是瑞士人第一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进行了足球比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二度战败，但这也没有阻止瑞士于1950年再次成为第一个在二战后和德国举行足球比赛的国家。最后，瑞士人在1954年成为世界杯的东道主，帮助德国共同创造了“伯尔尼奇迹”。

1920年之所以成为德国足球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一年，德国在战后首次举行了全国冠军比赛，纽伦堡击败了菲尔特队，获得了它在地区联赛中的第一个冠军。同样是在纽伦堡，瓦尔特·本泽曼创办了专业性的杂志《踢球者》！现在，这种“粗野的脚下游戏”甚至有了自己的，也就是说有了知识方面的上层建筑。这一事件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民主化萌芽一起，都对德国足球运动的普及作出了贡

献。足球大众化的时代在德国开始了。一年以后，《踢球者》便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足球运动员是职业选手还是业余选手？是的，还是因为这可爱的钱的缘故。通货膨胀导致同时发行的裁判员报纸在 1923 年损失了 20 亿德国马克，而德国足球正直诚实的化身，泽普·赫伯格，因为非法收受保证金，引发了第一次证据确凿的足球丑闻。作为球员，他不得不离开曼海姆-瓦尔德霍夫俱乐部。

但是，“德意志价值观”并未因为新式比赛而完全丧失，1924 年的德国国家队可以证明这一点。它的队员全部来自纽伦堡和菲尔特两个俱乐部。因为地区之间竞争激烈，在去荷兰参加客场比赛的路上，两地队员居然分乘两个车厢，菲尔特队员在前，纽伦堡队员在后。他们联手打败了荷兰，然后又分乘火车返回帝国。几年来，担任国家队教练的一直都是奥托·内尔茨教授，一位学者。内尔茨崇尚英式足球，曾秘密前往英国，后来还出版了自己系统的训练理论小册子。在 1936 年 8 月 7 日的奥运会上，他经历了自己事业的低谷。元首第一次也是谁——一次亲自到体育场观看比赛。颇有传奇色彩的恩斯特·勒内在包厢里吓得一身大汗，其情形显然与 1999/2000 赛季中的多特蒙德—博鲁西亚队相似：脑袋不转了，双腿灌满了铅，比赛死气沉沉 最终以 0：2 败北，输给了挪威！

现在，局势可真的紧张起来了。于是，“埃里希和乌利”以及“埃里希和霍斯特”这两对组合的先驱诞生了。在此期间，德国足协被德国“足球专管局”合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足

埃里希·里贝克和乌利·斯蒂利克，德国足球队教练。

埃里希·里贝克和霍斯特·赫鲁伯斯，德国足球队教练。

协发布的官方通告：“内尔茨即日起不再担任帝国教练，只负责国家队。赫伯格做他的助手。”也就是说做球队的领队——比弗兰茨·比肯鲍尔早了五十年！“泽普和奥托”成了那些“佩戴国徽者”（指足球队员）的首领，而不是“埃里希和乌利”。

1938年，赫伯格单独负责国家队。有趣的是他和足球战略家内尔茨之间的关系。内尔茨是他的导师。在瓦尔德霍夫丑闻之后，内尔茨在柏林火车站拦住了他，将他接了回去。尽管他没有参加过中学毕业考试，内尔茨还是在柏林给他弄到了一个进大学学习的机会。赫伯格作为教练参加了1938年在法国举行的世界杯。由于政治原因，他必须和奥地利人一同组成大德意志联队参加比赛。这样，著名的布雷斯劳队便在上级命令下解散了。

第二节 足球圈内的权贵、黑钱、“润滑油”

合同球员、官员和假职业选手

金钱主宰世界，当然也主宰足球。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例外。但是，在足球史上，特别是在德国足球史上，或许曾经有过。体育运动从最初强身健体的体操，发展到了足球这种吸引大众的团队运动。大众吸引力总是和权力、销售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如果放在“老大哥时代”会更容易理解。必要的联系纽带则是金钱。1924年，奥地利建立了欧洲大陆（不包括英国）上的第一个职业足球联赛。随后，前后相隔各为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意大利也相继有了本国的职业联赛。

1931年，法国也加入了进来。还在30年代的时候，职业足球联赛就已经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劳务市场，其中外籍球员的比例已超过30%！1927年，意大利的职业联赛才刚刚建立起来，1928年便有了第一次转会记录。莱蒙多·奥西原籍阿根廷，后来加入了意大利国籍。他以天文数字的8000里拉月薪以及一辆新的菲亚特轿车转会到了都灵俱乐部，也就是今天的尤文图斯。尤文图斯当时和现在都掌握在菲亚特公司手中。

在20年代时，德国足协的观点就已经落伍了，或者说说是极端保守？职业足球被描绘成一种“严重的疾病”。带来的结果是，与国外职业球队的友谊赛和对抗赛都被自觉抵制。

不过，业余运动员的崇高理念已经不灵了，这在球员赫伯格事件上已经得到了提前反映。一开始的时候，人们试图采用“费用编号”的方法。由于德国足球史上首次证据确凿的俱乐部丑闻事件的缘故，一直以来运转顺利的沙尔克陀螺开始受到了负面影响。眼看着黑金丑闻及其后果将把沙尔克04俱乐部推入深渊，俱乐部财务主任便只有一条出路了：自杀。这是1930年的事。由于足球吸引着大众，它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了。1920年，德国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足球冠军决赛，观众人数几乎是一战前最后一次决赛的六倍。1928年，纽伦堡市长在祝贺海纳·施图尔福特和他带领的球队在与巴黎红星队的客场比赛中获胜时说：“您和您的球队为我们、为德国体育所做出的贡献，是十个外交官也无法做到的。”由于足球比赛有后勤保障，球员与普通市民相比便享有诸多特权。反正在英国是这样的。在英国，职业足球自1885年起就已经合法化了，1889年甚至有了世界上第一个职业足球联赛。这一切对于德国人来说只能是梦想。在